

## 《大唐西域記》卷第十一增入部分小考

高田時雄（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

### 壹、緒言

《大唐西域記》諸版本中在明代之後的幾個版本裡，第十一卷「僧伽羅國」條裡可看到增入了多達五一六字是廣為人知的。增入部分主要是在敘述永樂年間鄭和攻佔斯里蘭卡的事記。唐代撰述的《西域記》中像這樣突然出現增入原文的，應該是讓人感到非常吃驚，但是對於被收錄在歷代藏經中那樣有淵源的文獻所進行的變更，其背後所蘊含的相當程度的作用力量，是值得探討的吧。本文想要釐清這些羈入到底是從哪個版本開始、如何被傳承下來的。另外，盡可能的推測出有關進行增入的經緯和歷史背景。

### 貳、增入從哪個版本開始？

關於有問題的增入部分，一九七一年水谷真成氏在《西域記》日語譯解<sup>①</sup>裏指出如下。

現在流傳的明藏中，在卷十一裡，明成祖永樂年間（一四〇三—二四）宦官鄭和下西洋（西南亞）時，有新插入文一頁多，主要是在僧伽羅國進行的戰鬥的記事。（此說法不是調查了明藏所有版本，所以非針對所有的版本而言的。永樂以前的版本，例如在金陵版的南藏等裏就沒有

新加入的文，也有可能是補刻的，故無法斷言。）

增入的問題在中國出版了校點本的章異氏也指出是在於「明北藏本及以後之徑山本等加入」<sup>②</sup>。既然要收錄鄭和的事記，增入部分就當然必須是在永樂以後。在這層意義上水谷先生所指出的金陵版的南藏（即洪武南藏）沒有收錄的事也是當然的。水谷先生極為簡單的敘述了永樂以後的明代藏經增入部分，而且水谷先生也提到補刻的可能性，但是這牽涉到問題變得更複雜，在此不提。另一方面，章異先生極為具體的指出增入部分是北藏本及徑山本。但是果然是那樣嗎？現在我們首先應該做的是逐個的來驗證明代以後《西域記》相關的原文是否有增入的部分。

事實上關於在明代刊刻的藏經到今天為止本來就不是那麼明確，除了嘉興藏（徑山藏、方冊本）都處於無法看到實物的艱難狀況。到了近年洪武南藏（初刻南藏）和永樂北藏的全藏影印出版，另外雖然只有一部份，《中華大藏經》用永樂南藏為底本，彼此間的比較就變的可能。單就《西域記》來說，現在才具備了調查所有原文的條件。

據筆者的調查，結果如下。這裡也包含清代的龍藏以提供參考。

- 明洪武南藏 ×
- 明永樂南藏 ○
- 明永樂北藏 ×
- 明萬曆嘉興藏 ○

#### 清龍藏 ○

收錄在《中華大藏經》第六十冊《西域記》卷十一是以《金藏廣勝寺本》為底本<sup>③</sup>，在其校勘記裡註有「七三一頁上三行與四行之間、『南』、『徑』、『清』有〔僧伽羅國……無量功德〕附文五百一十六字。此段文字為明代人後加。茲據南藏本附于卷後、以供參考。」<sup>④</sup>。順便一提章異先生所指出的明北藏本裏看不到增入的部分<sup>⑤</sup>。我認為章異先生只看了嘉興藏本，而沒有實際的檢查了北藏本吧。在嘉興藏的《刻藏緣起》〈刻藏凡例〉<sup>⑥</sup>開頭第一條裏有「南北宋元四藏、惟北藏本較善、是刻故以北藏為主」，所以一般上嘉興藏被認為以北藏為底本使用。或許是章異先生對於那樣的說法沒有經過批判就採用了吧。但實際上北藏本《西域記》裡增入的部份是並不存在的。嘉興藏本採用冊子本的形體出版，容易翻讀，所以一般廣受歡迎。加上因應世間的需求，在嘉興楞嚴寺印刷販賣，所以流傳頗為廣泛，近來過去《西域記》的原文大體上都是承襲著這個版本。嘉興藏的刻印原本從很早就構思了，到了萬曆初年才漸漸的正式發議。同十七年在山西的五臺山開始雕造。但是五臺山位於北方寒冷地帶，在工匠的安排上諸多不便，在萬曆二十年移轉到浙江餘杭的徑山。該刻藏除了正藏以外，包含了續藏、又續藏，繼續刻到清朝初年。端看《西域記》其版刻似乎完成於西元一六四六年。看《嘉興藏本》的《西域記》第十二卷末的刊記，記有「嘉興府楞嚴寺經坊餘貲刻此大唐西域記／十一、十二卷計字二萬四百八十該銀十／兩二錢四分丙戌年季春月般若堂識」。這裡記的是在丙戌年刻成，沒有寫年號。這時期、明

已實質上滅亡了，清軍從北方如怒濤般的不斷進攻而來，丙戌年在清朝年號是順治三年，在前一年的順治二年多爾袞親王的清軍降伏了佔領南京的福王，隔年順治三年，也就是本書刻版之年，在福州就任帝位的唐王被捕獲，在紹興據領的魯王敗退。如果從歷史上看的話，明清鼎革的歸趨是清楚的，但在江南的嘉興府裡依然有許多人不屑於採用清朝年號。方冊藏經的《西域記》因在這一年刻印，所以不稱年號，只寫「丙戌年」。這個時期有無條件採用北藏本為刻印《西域記》的底本難以知曉，至少南藏本的話，就勿須懷疑其使用的方便了。事實上，嘉興藏僧伽羅國條裏就使用了增入的原文。無論如何，在增入版本當中最古老的就是永樂南藏，之後增入原文的都從該本衍生出來的。

### 參、增入本的傳承

那麼永樂南藏開始的增入本，明清時期是如何傳承的呢？《西域記》的原文大致上可分為藏經本與藏外本。在上節概述了藏經本，這裡也想簡單的提一下藏外本。若佛家以外的一般人士讀《西域記》的話，其使用的原文一般以藏外本為多，其影響還是藏外本比較大。

《西域記》在明代以前藏外本不存在，因此一般人們讀《西域記》有一定的困難，而且事實上這著作到近代為止沒有被廣泛閱讀的行跡。在今日對於享有古典名著的高譽、無人不知的本書，這樣的事實或許可說是稍感意外。在民間最初出版的《西域記》是明末萬曆年間吳氏刊本。

這本也是《四庫全書》本的底本。以下的文稍長，是引用《西域記》的四庫提要<sup>7</sup>。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唐釋玄奘譯，辯機撰。玄奘事蹟，具舊《唐書》列傳。晁公武《讀書志》載是書，作玄奘撰，不及辯機。鄭樵《通志藝文略》則作《大唐西域記》十二卷，玄奘撰；《西域記》十二卷，辯機撰，又分為兩書。惟陳振孫《書錄解題》作大唐三藏法師玄奘譯，大總持寺僧辯機撰，與今本合。考是書後有辯機序，略云：「玄奘法師，以貞觀三年，褰裳遵路，杖錫遐征，薄言旋軻，謁帝洛陽，肅承明詔，載令宣譯。」辯機為大總持寺弟子，撰斯方志，則陳氏所言，為得其實矣。昔宋法顯作《佛國記》，其文頗略，《唐書》西域列傳，較為詳核。此書所序諸國，又多《唐書》所不載，則史所錄者，朝貢之邦，此所記者，經行之地也。《讀書志》載有玄奘自序，此本佚之。惟前有尚書左僕射燕國公張說序，後有辯機自序，句下間有註文，或曰唐言某某，或曰某印度境，疑為原註。又有校正譯語，云舊作某某者，及每卷之末，附有音釋，疑為後人所加。第十一卷僧伽羅國條中有明永樂三年太監鄭和見國王阿烈苦柰兒事。是今之錫蘭山，即古之僧伽羅國也，至祈福民庶作無量功德，共三百七十字，亦註者附記之語，吳氏刊本，誤連入正文也。所列凡一百三十八國中，摩揭陀一國，釐為八、九兩卷，記載獨詳，所述多佛典因果之事，而學其地以實之。晁公武《讀書志》稱玄奘至天竺求佛書，因記其所歷諸國，凡風俗之宜，衣服之制，幅口

之廣隘，物產之豐嗇，悉學其梗概，蓋未詳檢是書，特姑據名為說也。我皇上開闢天西，咸歸版籍，欽定西域圖志，徵實傳信，凡前代傳聞之說，一一釐正。此書侈陳靈異，尤不足稽，然山川道里，亦有互相證明者，姑錄存之，備參考焉。

在這裡也有提及僧伽羅國條增入一事，但從提要看起來似乎只有從「今之錫蘭山」到「祈福民庶作無量功德」三百七十字為註者附記而加入的，因註有「吳氏刊本，誤連入正文也」。前接的一百四十六字則認為不是增入的。確實關於這部分，如果沒有和更舊的原文比較的話，只從文面上是難以輕易的做判斷的，從當時原文流傳的情況看來也無法歸咎於此。《四庫全書》本的《西域記》是依據浙江的鮑士恭家藏本<sup>⑧</sup>。提要中提到「吳氏刊本」給人稍有唐突的感覺，那可能是因為鮑士恭進呈本即吳氏刊本已成為暗默的前提，所以吳氏刊本裏有增入部分。那麼到底吳氏刊本是怎麼樣的版本呢？

吳氏名瑄、字仲虛、號中雲。原籍福建漳浦。隆慶五年的進士、曾任婺源縣令等，離任後，在安徽的歙縣建構了「西爽堂」從事出版事業<sup>⑨</sup>。西爽堂的刻書有『合刻山海經水經注』二種五十八卷（萬曆十三年·一五八五）、《三國志》六十五卷、《晉書》一百三十卷、《詩紀》一百五十六卷（萬曆四十一年·一六一三）、《古今逸史》五十五種等，可知主要從事比較大部頭著作之出版。其活動主要是在萬曆年間，根據目錄等在崇禎四年也刊印出版了王徵的《新制諸器圖說》一卷<sup>⑩</sup>。《西域記》也是吳氏西爽堂的刻書之一，這在今日是極為稀有的傳本<sup>⑪</sup>。很

可能是在萬曆年間刊印出版的吧。該吳氏在刊行《西域記》，是選什麼為底本的呢？就如以上所看到的，這時期嘉興藏未見刻成，故不得不認為那是依據永樂南藏的。但看吳氏刊本各卷末裏附載的音釋，從卷一到卷八使用由福州藏而來的相當詳細的音釋覺得有些奇異。卷九以後，只有卷十對僅有七語有簡單的音釋，這部分基本上與南藏是一致的<sup>⑫</sup>。那麼如果說吳氏刊本是混合使用福州藏與永樂南藏為底本的呢，未必正確。在福州藏裏，《西域記》從卷一到卷八收藏在轉字函裏，卷九到卷十二收藏在疑字函裏。而且通常音釋是每一函附有獨立的字音帖。所以把吳氏設定為取福州版的轉字函音釋，再把它替換到永樂南藏卷末的音義的話是比較容易理解的。永樂南藏本的音釋，卷二有十語、卷四五語、卷五三語、卷七、卷八各五語、卷十七語、卷十二一語、只有極為簡單的音釋而已，其他卷裏完全沒有附任何音釋。從此看來福州藏的字函音釋對吳氏來說是非常的有魅力的。只是吳氏不幸的沒法獲得疑字函的音釋，所以從卷九到卷十二無法使用福州藏的音釋。結果永樂南藏卷末音義只存有卷十的七語而已<sup>⑬</sup>。

接下來我覺得有必要在此整理一下有關永樂南藏的問題。明朝太祖洪武帝計畫刻印大藏經並實行之。但該藏經的實物不見了很長一段時間，就好像是夢幻的藏經。然而正在日中戰爭的一九三八年，根據支那內學院的調查，從四川成都市附近的崇慶縣的上古寺發現了該藏的全藏<sup>⑭</sup>。被稱為洪武南藏（初刻南藏）就是該藏，在今日以明朝最初的藏經廣為人知道。然而到了永樂五年，安置此藏經版片的南京天禧寺發生火災，所有的經版都化為烏有。因此永樂帝就開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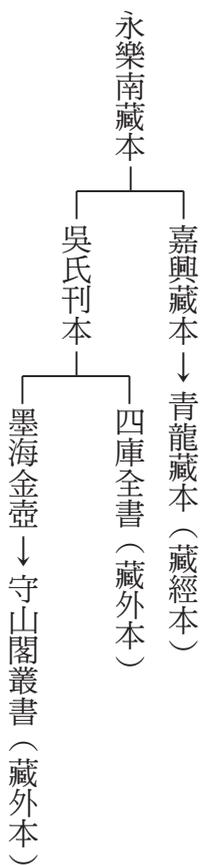
新的藏經，就是後來的永樂南藏，也稱為再刻南藏。此藏經在永樂十七年完成<sup>15</sup>。一般認為因為洪武南藏的版片全部燒毀，所以永樂南藏全都是重新再雕刻的。但是到了近年野澤佳美氏發表了這樣的新的說法：因永樂五年發生的火災而被燒毀的洪武南藏的版片只是當中的一部分，永樂南藏是利用洪武南藏的版片而重新再編集的。其根據大約如下。洪武南藏的續藏是在永樂十二年未完成刻版的，隔年有好幾個寺院在南京請求「大藏經」。這一「大藏經」不可能是永樂南藏，必定是洪武南藏。而且四川省圖書館所藏的洪武南藏是永樂十四年蜀王朱椿奏請其兄永樂帝下賜而得的，由此可知當時洪武南藏時還存在著的。另一方面，永樂南藏是在永樂十七年完成的，中間只相隔四年，這樣的時間彫造一部大藏經實在是太短了<sup>16</sup>。

那《西域記》是否是利用洪武藏的版片呢，這大概不太可能。為什麼呢？因為只要永樂南藏有增入鄭和的記事，就只能有新的刻版。以上是水谷真成氏對補刻所提及的。若從野澤氏的新說來看，那樣的指摘在某個意思上可說是有的。因為當時有闡明藏並不那麼廣為人知，因此水谷氏不得不那樣說，但其想法並沒有偏離太多。順便一提今日我們看得到的永樂南藏本的《西域記》果然是後來的補刻，無法確認原刻本<sup>17</sup>。但這補刻是因為原來的板片磨損不能再使用而補刻的，應該是忠實的按照原刻本而模刻的，所以僧伽羅國的增入部分應該是在永樂年間的原刻時增入的吧。

繼續來看關於藏外本。吳氏刊本以後出現的版本有二種，皆收錄在清朝而且是中期以後刊行的叢書裏。首先是張海鵬的《墨海金壺》所收本，在嘉慶十六年（一八一—）刊行<sup>18</sup>。這一版本裏有增入部分，但五百十六字當中前半的一百四十六字（從僧伽羅國古之師子國到精意懇祈靈祥隨至）是以大字印出，後半的三百七十字（從今之錫蘭山到無量功德）以雙行割注，明顯的是承接提要的說法，將吳氏刊本裏以大字印的後半三百七十字改為這樣的注文形式。單從這裡來看的話，可以考慮《墨海金壺》本不是從吳氏刊本，而是以四庫全書本為底本的，但到底底本是吳氏刊本還是四庫全書本還有研究的餘地。因為在《墨海金壺》本裏，與吳氏刊本一樣，第一卷的卷末裏附有對從「猷」字開始共五十四語的序文的音釋以及從「屈支」開始共八十一語的第一卷音釋。與此相對的，四庫全書本至少依據文淵閣本來看的話，序文的音釋是缺少的。因此，如果《墨海金壺》本全部都是以前四庫全書本為底本的話，就無法說明其序文音釋是從何而來的。從這點看來，不得不認為《墨海金壺》本也是直接的承接自吳氏刊本。

另一個版本是《守山閣叢書》所收錄的，於道光年間刊行。《守山閣叢書》是錢熙祚在道光年間取得張海鵬《墨海金壺》的殘版後補訂刊行的。但是錢氏認為《西域記》諸本有許多錯誤，「昭文張氏所刊（即《墨海金壺》本）尤甚」，以嘉興藏加以校正。關於問題的增入部分也認為後人的附益而非三藏原文並全部刪除<sup>19</sup>。到了這裡永樂南藏開始增入的部分終於被刪除掉<sup>20</sup>。

整理上述的內容，明代以後的《西域記》諸版本的傳承關係可圖示如下。



## 肆、鄭和的參與

如果把僧伽羅國的記事最初在卷十一增入《西域記》的永樂南藏看成是在永樂十七年（一四一九）刻成全藏的話，那增入的部分就是發生在可說是該記事的主角鄭和（一三七一—一四三四）尚在世的時候了。為了推測增入的部分是什麼樣的經緯而成的，首先要先確認這記事所記的事件。鄭和俘獲錫蘭山國王亞烈苦柰兒（Alagakkondira）帶回南京是在其第三次航海的時候，該航海時從永樂七年（一四〇九）到永樂九年（一四一一）。該事件在《明太宗實錄》永樂九年六月條裏有記載，以下是其摘要<sup>21</sup>。

（永樂九年六月）乙巳內官鄭和等使西洋諸番國還，獻所俘錫蘭山國王亞烈苦柰兒，竝其家屬。和等初使諸番至錫蘭山，亞烈苦柰兒侮慢不敬，欲害和，和覺而去。亞烈苦柰兒又不輯睦鄰國，屢邀劫其往來使臣，諸番皆苦之。及和歸復經錫蘭山，遂誘和至國中，令其子納顏索金銀寶物。不與，潛發番兵五萬餘劫和舟，而伐木拒險絕和歸路，使不得相援。

和等覺之，即擁眾回船。路已阻絕，和與其下曰，賊大眾既出，國中必虛，且謂我客軍孤怯不能為，出其不意攻之，可以得志，乃潛令人由他道至船，俾官軍盡死力拒之，而躬率所領兵二千餘，由間道急攻王城，破之。生擒亞烈苦柰兒并家屬頭目，番軍復圍城，交戰數合，大敗之，遂以歸。群臣請誅之，上憫其愚無知，命姑釋之，給與衣食，命禮部議，擇其屬之賢者，立為王以承國祀。

據實錄，鄭和在永樂九年六月十六日凱旋歸國<sup>22</sup>。另外根據增入部，那之後不久，到永樂九年七月九日舉行了盛大的佛牙奉迎儀式。在實錄的記事裏完全沒有提到佛牙，而在增入部裏，戰鬥的事跡也有相當的著墨，但仔細一讀，發現主題始終都是圍繞在佛牙的請來。讓人覺得在這裡似乎有什麼關鍵。

然而到了最近，有和《西域記》卷十一增入部幾乎同樣的原文在永樂帝贈與西藏活佛哈立麻喇嘛（葛瑪派五世 De bzhiñ gshags pa）的敕書中可看到這樣的驚人報告。現在方便比較，請參照附在文末的對照原文的粗體。報告這一致的是南京大學的劉迎勝教授<sup>23</sup>。同教授找到宋伯胤氏過去介紹的，西藏各處發見的計十二件明代誥敕當中賜與哈立麻喇嘛的敕書的文章，和嘉興藏本的《西域記》僧伽羅國條的增入部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推測這增入部的原文是從永樂十一年的敕書來的，或兩者來自共通的史源。的確比較兩者看看，其一致性是顯而易見的，因此兩者應該有著什麼樣的關係吧。特別是除實錄外，《明史》、《星槎勝覽》等與鄭和相關聯的史料裏，錫

蘭山王的名字寫做「亞烈苦柰兒」，但只有在《西域記》增入部和敕書裏，也皆作為「阿烈苦柰兒」，不禁讓人想到其密切的關係。但這一致性不只是永樂敕書和嘉興藏的問題。如以上所見，增入的部分從永樂南藏開始，因此原文的一致必須重新考察其與永樂南藏的關係。

首先必須來看看哈立麻喇嘛這個人。永樂早在即位當年就已經想到政治上應利用西藏佛教的影響力而奉迎哈立麻喇嘛，哈立麻因此在永樂四年十二月來到了京城<sup>24</sup>。哈立麻在隔年永樂五年二月在南京主持高祖高皇帝和孝慈高皇后的佛事<sup>25</sup>，更在七月於五臺山為大行皇后建醮<sup>26</sup>。他辭歸西藏大約在永樂六年四月<sup>27</sup>。永樂也盡其所能的款待，哈立麻的來訪朝野學國的關注。

另一方面鄭和第一次航海歸國是在永樂五年九月<sup>28</sup>，到隔年六年九月受命再度出使<sup>29</sup>為止，都留在國內。這之間鄭和與哈立麻接觸的可能性很高。如之後所敘述的，深信並歸依佛教的鄭和，即使為哈立麻所傾倒也非不可思議。然而如以上揭示的，如果對哈立麻頒發敕書是在永樂十一年二月的話，那就已經過了五年以上的時間。假使在前一年帶回佛牙的鄭和，這時候已經受命第四次出海，為了航海的準備而還留在南京。聽聞了自己敬慕不已的哈立麻的受賜的敕書中，記錄著自己的佛牙的請來的鄭和，不難想像其熱切的想要得到該文的全文，而且這對鄭和也是極為簡單的事。照推測，也可想像鄭和私底下要求永樂在敕書中寫入與自己的佛牙請來有關的事實。再說為了更廣更長遠的流傳佛牙請來的事蹟，在《西域記》的原文裡暗地裡加入敕書的內容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鄭和本姓馬，雲南的回族出生，但是位熱心的佛教徒。眾所周知明代的宦官多為深信佛教的歸依者<sup>30</sup>，鄭和也不例外。有許多證據證明他是佛教徒。永樂元年（一四〇三），鄭和約三十三歲已經受菩薩戒，以法名福善的在家僧的身分刊行了《佛說摩利支天經》<sup>31</sup>。不僅如此，相傳鄭和也常常印造藏經布施給各地寺院。按年代列舉如的話，就如以下<sup>32</sup>。

- 永樂五年（一四〇七）靈谷禪寺（南京）
- 永樂八年（一四一〇）雲南五華寺
- 永樂九年（一四一一）天界禪寺毘盧寶閣（南京）
- 永樂十三年（一四一五）福建南山三峰塔寺（長樂）
- 永樂十八年（一四二〇）鎮江金山禪寺（鎮江）
- 永樂二十二年（一四二四）靜海禪寺（南京）
- 宣德四年（一四二九）牛頭山佛窟禪寺（南京）
- 宣德五年（一四三〇）北京皇后寺（北京）
- 宣德五年（一四三〇）鷄鳴禪寺（南京）

這些當中關於雲南的五華寺，鄭和印造布施的記事在雲南省圖書館裡留有以下的題記<sup>33</sup>。

大明國奉

佛信官太監鄭和，法名福吉祥，謹發誠心，施財命功印造大藏尊經一藏，計六百三十五

函，喜捨於雲南五華寺，永遠長生供養。以此殊勳，上祝梵圖永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輝，法輪常轉，海晏河清，民康物阜。所冀福吉祥凡奉命於四方，經涉海洋，常叨恩於三寶，自他俱利，答報四恩，均資三有，法界有情，同緣種智者。

永樂十八年歲次庚子五月吉日福吉祥謹題。

這題記是在永樂十八年題的，上揭《優婆塞戒經》的題記看成是漏了「十」字而成永樂八年比較好<sup>32</sup>。上記九藏當中，若假定布施給雲南五華寺是永樂十八年的話，從時間上來看，除了永樂五年、永樂九年、永樂十三年藏的藏經想像為洪武南藏外，那之後的都是永樂南藏，故不得不考慮在其《西域記》裏有增入部分。鄭和這麼熱心的布施藏經，若認為是因為有著這樣的秘密是否太過了呢。

然而在這題記裏法名福善寫成福吉祥。附帶一提這法名是藏語 *bsod-nams-bkra-shis* 的漢譯，有此一說鄭和皈依的是西藏佛教<sup>35</sup>。若是這樣的話，他與哈立麻的關係就更帶有真實的味道了。另外，也有人認為取材自「鄭和下西洋」的《三寶太監西洋記》小說裏航海的守護神金碧峰事實上就是哈立麻<sup>36</sup>。關於《西洋記》的金碧峰有各種說法，筆者對此新說想要表示贊同。哈立麻實際上當然沒有和鄭和一起參加航海。但小說的作者羅懋登把哈立麻看做是鄭和航海的守護神，那也就是說明代人在民間認為哈立麻和鄭和之間有著密切的關係的一個佐證吧。

上述布施藏經的事實已足於想像鄭和傾心於佛教，到了最近又出現了一個講述鄭和的佛教信仰的證據<sup>37</sup>。那就是於二〇〇二年浙江省的平湖報本塔中發見的金泥書寫的《妙法蓮華經》。這經卷的卷末裏附有名為圓滯的僧的跋，在其後的蓮華紋的牌記中更記有鄭和的發願文。「大明國奉佛信官鄭和，法名福吉祥，發心鑄造鍍金舍利寶塔一座，永遠長生供養。所冀見生之內，五福咸臻，他報之中，莊嚴福壽。宣德七年九月初三日意。」這似乎是鑄造舍利塔的同時讓其書寫《法華經》的，而且當時已經是鄭和的晚年時期了。鄭和對佛教的信仰似乎一生都不變。無論如何，鄭和傾心於佛教已是很明確，甚至到用敕書的文句在《西域記》僧伽羅國條裏加入奉迎佛牙的事實，其原動力就在於此。

關於永樂南藏的增入部分再做些補充。如以上所述，鄭和布施藏經的佛寺大部分都是南京的寺院。從此也可以推測鄭和作為一位大檀越對南京佛教界行使了其影響力。不僅如此，彫造永樂南藏的是南京的報恩寺，這寺院是天禧寺燒毀後，永樂帝為了稱揚父母的恩德於永樂十年（一四一二）建立的，鄭和自己擔任建寺的監工官<sup>38</sup>。鄭和從當初刻印永樂南藏時就與現場有強大的聯繫。因此不僅令人懷疑鄭和的參與是越來越深入的。

那進行增入的時期是什麼時候呢？應該以哈立麻受賜敕書的永樂十一年二月為上限，完成永樂南藏的永樂十七年末為下限。而實際上這時期有可能更早。在野澤佳美氏的說法，永樂南藏在逃過火災災難的洪武南藏的基礎上重新開編應該是在永樂十四年十月<sup>39</sup>。但就《西域記》來說，在永樂五年遭受火災之厄難的同書的重刻，也有可能比十四年更早的時期就進行了吧。和給哈立

麻的救書的時間差距不設定為太長，比較容易說明其與《西域記》原文的一致性。筆者認為從永樂十一年二月救書下賜後不久就加入的增入的部分。當然這是個人的想法，嚴密的來說永樂十一年二月以後到永樂十七年末之間才是正確的。

## 伍、小結

明代以後刊行的《大唐西域記》卷十一僧伽羅國條裡，可看到與鄭和有關於的記事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但這些增入是始自於何時怎麼樣的版本，經過了什麼樣的經緯等等，這些到目前為止並不是那麼明確。本文詳細的檢討了各種版本，找出從永樂南藏開始以及他們的傳承關係，更從與近年新發現的永樂救書的關係出發，也勘案鄭和的佛教信仰，推測從永樂十一年到永樂十七年之間，鄭和親自關與而進行了增入。雖然只不過是指出了一小事實，但是如果對《西域記》的研究以及鄭和的事研究有所幫助的話，則感到榮幸。

### 【附錄一】《西域記》增入部分

**僧伽羅國古之師子國，又曰無憂國，即南印度。其地多奇寶，又名曰寶渚。昔釋迦牟尼佛化身名僧伽羅，諸德兼備，國人推尊為王，故國亦以僧伽羅為號也。以大神通力，破大鐵城，滅羅剎女，拯恤危難。於是建都築邑，化導是方，宣流正教，示寂留牙，在於茲土，金剛堅固，歷劫**

不壞，寶光遙燭，如星粲空，如月炫宵，如太陽麗晝。凡有禱禳，應答如響，國有凶荒災異，精意懇祈，靈祥隨至。【今之錫蘭山，即古之僧伽羅國也。王宮側有佛牙精舍，飾以眾寶，輝光赫奕，累世相承，敬禮不衰。今國王阿烈苦柰兒，鎖里人也。崇祀外道，不敬佛法，暴虐凶悖，靡恤國人，褻慢佛牙。大明永樂三年，皇帝遣中使太監鄭和奉香花往詣彼國供養。鄭和勸國王阿烈苦柰兒敬崇佛教，遠離外道。王怒即欲加害，鄭和知其謀，遂去。後復遣鄭和往賜諸番并賜錫蘭山國王，王益慢不恭，欲圖害使者，用兵五萬人，刊木塞道，分兵以劫海舟。會其下預泄其機，鄭和等覺，亟回舟。路已阨絕，潛遣人出舟師拒之，和以兵三千，夜由間道，攻入王城守之。其劫海舟番兵，乃與其國內番兵，四面來攻，合圍數重。攻戰六日，和等執其王，凌晨開門，伐木取道，且戰且行，凡二十餘里，抵暮始達舟，當就禮請佛牙至舟，靈驗非常，光彩照耀，如前所云。旬延震驚，遠見隱避，歷涉巨海，凡數十萬里，風濤不驚，如履平地，鯨龍惡魚，紛出乎前，怡不為害，舟中之人，皆安穩快樂。永樂九年七月初九日至京師。皇帝命於皇城內莊嚴旃檀，金剛寶座貯之。式修供養，利益有情，祈福民庶，作無量功德。】（依據永樂南藏本。以【】括起來的後半部是因版本不同在夾注裡註示的部分。）

### 【附錄二】永樂敕書

大明皇帝致書

萬行具足十方最勝圓覺妙智慈善普應佑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朕嘗靜夜端坐宮殿，見圓光數枚，如虛空月，如大明鏡，朗然洞澈。內一大圓光，現菩提寶樹，種種妙花，枝柯交映，中現釋迦牟尼佛像，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瞻視逾時，愈加顯耀心生，歡佛法興隆，陰口皇度，祝茲靈異，亦如來攝取受功至，有是嘉徽。乃命工用黃金范為所見之像，灌頂大國師班月藏卜等公佈祝慶讚。朕曩聞僧伽羅國古之師子國，又曰無憂國，即南印度。其地多奇寶，又名曰寶渚，今之錫蘭山是也。其地有佛牙，累世敬祀不衰。前遣中使太監鄭和奉香花往詣彼國供養。其國王阿烈苦奈兒，鎖裡人也。崇禮外道，不敬佛法，暴虐凶悖，靡恤國人，褻謾佛牙。太監鄭和勸其敬崇佛教，遠離外道。王怒，即欲謀害。使臣鄭和知其謀，遂去。後復遣鄭和往次諸番，並賜錫蘭山王。王益慢不恭，欲圖害使者。發兵五萬人，刊木塞道，分兵以劫海舟。會其下洩其機，和等覺。亟日舟路已厄絕，口遣人出舟師拒之。和以兵三千，夜由間返攻入王城，守之。其劫海舟番兵，乃與其國內番兵，四面來攻，合圍數重，攻戰六日。和等執其王，凌晨開門，伐木取道，且戰且行，凡二十餘裡，抵暮始達舟。當就禮請佛牙至舟，夷異非常，寶光遙燭如星粲空，如月炫宵，如太陽麗晝。旬延震驚，遠見隱避。歷涉巨海，凡數十萬里。風濤不驚，如履平地。狩龍惡魚，紛出乎前，怡不為害。舟中之人，皆安穩快樂。永樂九年七月九日至京，考求禮請佛牙之日，正朕所見圓光佛像之日也。遂命工莊嚴旃檀金剛寶座，以貯佛牙。於是城內式修供養，□□□□，祈福民庶，作無量功德。今特遣內侯顯等致所鑄黃金佛像於如來，以此無

量之因，用作眾生之果，吉祥如意，如其亮之。永樂十一年二月初十日。

（宋伯胤「明朝中央政權致西藏地方誥敕」《藏學研究文集》（中央民族學院藏學研究所編，北京：民族出版社，一九八五，頁九三—九四。遼錄的錯誤或誤植的文字散見於中，今保持原狀。）

- ① 《大唐西域記》（《中國古典文學大系》第二十二卷），東京：平凡社，一九七一，頁四四一。
- ② 章巽校點本《大唐西域記》（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頁二五九。這本北藏本以後才開始的說法，章巽氏的《大唐西域記》闕文考辨）（《文史》第十三輯，一九八二，頁七十三）中也重複提到。
- ③ 《中華大藏經》的《西域記》只有卷十一及卷十二用金藏，其他使用高麗藏本。
- ④ 《中華大藏經》六十，頁七三—八一九。
- ⑤ 看《永樂北藏》（北京：綫裝書局，二〇〇〇）第五百五十一冊，頁八四一。
- ⑥ 《刻藏緣起》民國二十一年支那內學院刊本，頁五十二。
- ⑦ 在方便上，依據乾隆六十年杭州本《四庫全書總目》。《四庫全書》收錄的各書卷首裏提示的提要多少有些差別，但那些差別和本論的主旨不相抵觸，故不提。
- ⑧ 提要上是如此記載的，應該是沒有錯，加上從《四庫採進書目》（商務印書館，一九六〇）看《浙江省第四次鮑士恭呈送書目》，果然有「大唐西域記十二卷，唐釋元奘譯，四本」，可以確認這事實（頁八十九）。在乾隆三十九年發刊的《浙江採集遺書總錄》庚集（釋家類）裏刊載了《西域記》，加了「大唐西域記十二卷，刊本。右唐釋元奘譯，乃翻譯西域各國風土為撰次之」這樣的解說，當然是同樣的書。據《四庫採進書目》，除了《西域記》是鮑士恭所進呈的書以外，《江蘇省第一書目》（頁二十七），《河南省呈送書目》（頁一五六）也可看得到此書。前者十二本，後者是兩本。兩本或許不完整。在四庫全書館彼此比較對照後，被認為是採用鮑士恭進呈本為底本，但其選擇的基本標準是不明確的。從今日的觀點來看選用藏經本也沒問題，不是那樣結果顯得有趣。近年刊印的《四庫全書提要稿輯存》（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二〇〇六）收錄的《江蘇採輯遺書目錄》（歸安

- 姚觀元尺進齋綠絲欄抄本）裏也看得到《西域記》，共十三卷（《四庫探進書目》附錄裏也收錄為《江蘇採輯遺書目錄簡目》，頁一五六）。這可能是別出音釋為一卷的本子，似為藏經本。
- ⑨ 參照劉尚恒《徽州刻書與藏書》（揚州：廣陵書社，二〇〇三）頁七十二；方維保、汪應澤《徽州古刻書》（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四）頁五十三—五十四；徐學林《徽州刻書》（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五）頁八八—九〇等。但在最後這冊書裏吳氏刊本《西域記》附有《音釋》一卷「計二種十三卷」，不曉得是依據而來的。
- 至少在筆者調查的吳氏刊本裏，不附有獨立的《音釋》。
- ⑩ 這本書在中國國家圖書館裏收藏一本，但未見。
- ⑪ 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完整版在重慶圖書館（羅斯福圖書館）裡，上海圖書館（存卷一至八），北京市文物局（存卷不明）藏有殘本。筆者有幸看到前二者，因為都是兩卷為一冊，所以重慶本有六冊，上海本有四冊。綫裝本，左右雙邊，有界。每半葉十行，白口，版心題為《西域記》。因無刊記之類的，所以遺憾的正確的刊行年份不明。重慶本為張起元（不詳）的舊藏書，上海本為于右任的舊藏書。
- ⑫ 更正確的來說，在永樂南藏本卷十二末也有一語的音釋，可能是被忽略了。
- ⑬ 福州藏的音義使用反切的「反」字，而永樂南藏使用「切」字。這也是兩者音釋的體例上很大的差別。
- ⑭ 現在為四川省圖書館所藏，一九九九，四川省佛教協會刊行了影印版二四二冊。
- ⑮ 參照張新鷹《關於佛教大藏經的一些資料》《世界宗教資料》一九八一，第四期，三十七頁。或中國佛教協會編《中國佛教》五（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〇〇四）之（三十一，洪武南藏）（三十二，永樂南藏）（皆為呂澂執筆）。唯後者把天禧寺的火災當成是永樂六年是有誤吧。
- ⑯ 野澤佳美《明代大藏經史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一九九八）第五章「洪武南藏から永樂南藏へ」，特別是參照第二節「洪武・永樂兩藏の關係」。
- ⑰ 山口縣快友寺所藏的永樂南藏的《西域記》中，可看到卷九裏「堂主福政募 信氏蕭聲施」的補刻記。（「快友寺一切經調查報告書」山口縣教育委員會，一九九二，頁二三〇）。據野澤氏堂主福政的募緣活動是在天 七年以後，大概是崇禎年間。野澤前揭書，頁三二七。另外在中國國家圖書館裡有太監李朗於嘉靖三十年的重印本，慈聖宣文肅皇太后於萬曆十二年的增刻本（存卷一、二、七、八、十一、十二的六卷），皆未見。筆者在國家圖書館調查了別的南藏本，但可惜沒有判斷此本是原刻或是補刻的相關資料。
- ⑱ 在卷末的刊記有「皇清嘉慶十有六年，歲在重光協洽陽月，昭文張海鵬校梓」。
- ⑲ 錢熙祚的注記全文如下。「案別本此條後有明人附記五百十六字，皆大書。原本半作大書，半作雙行夾注，與下佛牙精舍側有小精舍一條聯合為一，殊屬魯莽。今案此係後人附益，非三藏原文，故悉刪之。」別本即嘉興藏本，原本在此指《墨海金壺》本。似乎沒有錢氏本身直接參考吳氏刊本乃至四庫全書本的形跡。
- ⑳ 但是那之後《國學基本叢書》本（民國二十三年初版）的《西域記》依據嘉興藏本，同樣的保存了增入的部分。但還是認為敘述鄭和的事蹟的後半段不穩當，而刪除後半的三百七十字。
- ㉑ 《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影印本第十二冊，頁一四七七—一四七八。
- ㉒ 乙巳是六月十六日。
- ㉓ 《嘉興藏本》《大唐西域記》「僧伽羅國」條的史源問題》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十九日，佛學研究網 <http://www.wjys.com/> 的佛學論文 b3 「研究綜論」中可看到。
- ㉔ 《明實錄》第十一冊，頁八九六：「（乙酉）尚師哈立麻至京，入見上御奉天殿。」
- ㉕ 同上，頁九一〇：「庚寅。尚哈立麻奉命率僧於靈谷寺建普度大齋，資福高皇帝，孝慈高皇后。」
- ㉖ 同上，頁九七七：「癸酉。命如來大寶法王哈立麻辭歸，賜白金綵幣佛像等物，仍遣中官護送。」
- ㉗ 同上，頁一〇五七：庚子。如來大寶法王哈立麻辭歸，賜白金綵幣佛像等物，仍遣中官護送。
- ㉘ 同上，頁九八七：「壬子。太監鄭和使西洋諸國還。」
- ㉙ 同上，頁一一一四：「癸酉。太監鄭和等齎敕使古里，滿刺加，蘇門答刺諸國，……賜其王錦綺紗羅。」
- ㉚ 何孝榮《明代宦官與佛教》《南開學報》二〇〇〇，第一期，頁十八—二十七。
- ㉛ 釋道衍（即廣孝，一三三五—一四一八）在此刊本裏加了題記「今菩薩戒弟子鄭和，法名福善，施財命工，刊印流通，其所得勝報，非言可能盡矣。福善一日懷香過余請題，故告以此。永樂元年歲在癸未秋八月二十又三日，僧錄司左善世沙門道衍。」據鄭鶴聲、鄭一鈞編《鄭和下西洋資料彙編》下冊（齊魯書社，一九八九）的卷頭圖版。
- ㉜ 根據附在《優婆塞戒經》卷七鄭和的題記。鄧之誠《骨董瑣記全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一九五五）「骨董三記」卷六，頁六一—六一四。但題記裏記有「今開陸續成大藏尊經計十一藏」，實際上只舉以下的九藏，後面的二藏不知為何寺所收藏。
- ㉝ 李希泌《鄭和印施《大藏經》題記—鄭和皈依佛門的左證》《文獻》一九八五，第三期。因附載圖版關係，有些地方有更改若干文字。
- ㉞ 這藏經是「六伯三十五函」也支持了那是永樂藏。永樂藏是從洪武藏加上大幅度的改編，函數從六百七十八函減

少到六百三十五函。參照野澤前揭書頁一五六—一五七。

③ 陳楠〈鄭和與藏傳佛教〉《傳承文明·走向世界·和平發展——紀念鄭和下西洋六〇〇周年國際學術論壇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〇〇五）頁六三六。

④ 馮漢「哈立麻來京的影響」《中國藏學》一九九一，第一期，頁二二八—三三。

⑤ 程傑「浙江平湖發現署名鄭和的《妙法蓮華經》長卷」《文物》二〇〇五，第六期，頁五十四—六十一；程傑·楊根文「平湖鄭和《妙法蓮華經》的發現及其意義」《傳承文明·走向世界·和平發展——紀念鄭和下西洋六〇〇周年國際學術論壇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〇〇五）頁六三六。

⑥ 見《鄭和下西洋資料彙編》上冊（齊魯書社，一九八〇）頁五二—五三所引的張惠衣《金陵大報恩寺塔志》。  
 ⑦ 野澤上揭書，頁一五九。